

中国脱贫攻坚的路径选择及其重要内涵^{*}

王 蕾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消除贫困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国的脱贫攻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探索形成逐步精准的渐进式道路，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的制度体系，成功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这种独特的路径选择，源自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与时俱进和生产力快速发展，实现扶贫格局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转变，更加注重树立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自身发力的意识，厚植脱贫攻坚中“人”的全面发展基础。

〔关键词〕 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 D23；D616；F1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98(2020)-05-0021-0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消除贫困进行了不懈努力，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绝对贫困发生率在80%以上，此后70年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1%，恩格尔系数从80%以上下降到28.4%，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过上了日益富足的生活。^①2019年年底，全国贫困人口降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②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本文重在研究和总结中国脱贫攻坚的路径选择及其深刻内涵，希望对做好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工作、实现乡村振兴有所助益。

一、中国脱贫攻坚的路径选择

70余年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有着独特的路径选择，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探索形成逐步精准的渐进式道路，建立健全一整套脱贫攻坚的科学制度体系。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是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过程中，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形成了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形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既是贫困治理的基础与前提，又为贫困治理成功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为的是让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化三改”、扫除文盲等，为的是让人民能够改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将经济发展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20年度特别委托项目“脱贫攻坚精神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度国情调研重大项目“贫困地区持续增收致富调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郑功成：《民生发展彰显中国制度与治理优势》，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wp/2020-01/13/c_1125453990.htm。

② 《脱贫攻坚战，也是产业和金融升级的“协奏曲”——专访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http://www.cpad.gov.cn/art/2020/7/8/art_624_182166.html。

成果传递到贫困人口，为的是让人民尽快从温饱阶段向小康生活过渡。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再次强调脱贫攻坚的目标：“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②这些努力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传承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脱贫攻坚与人民意识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根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连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强调脱真贫、真脱贫，真正把“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③的要求落到实处。截至2020年5月17日，在既有832个贫困县中，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22个省区市的780个贫困县已宣布脱贫摘帽。^④脱贫攻坚已进入总攻阶段，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有力保障，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二）坚持逐步精准的渐进式扶贫道路

中国脱贫攻坚经历了从保障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的演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实行生活用品给予和财政补贴的救济方式，即中央政府直接通过各地方政府把粮食、衣物或现金等分配给贫困户。1986年，开发式扶贫被确立为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农户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1994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对开发式扶贫作出具体规定：国家要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有条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半亩到一亩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户均一亩林果园，或一亩经济作物；户均向乡镇企业或发达地区转移一个劳动力；户均一项养殖业，或其他家庭副业；牧区户均一个围栏草场，或一个“草库仑”。^⑤

与此同时，国家逐步打破区划限制，逐步明确重点扶贫地区和贫困县。1986年，国家首次划定14片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273个“贫困县”，这是中国脱贫攻坚实践的一个突破。1988年，又以此为基础进行增划和调整，把全国贫困地区划分为18片。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对贫困发起攻坚战，并按新的贫困标准，划定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200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对21世纪前10年的扶贫开发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纲要》根据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中西部、遍布全国各地农村的分布特点，再次调整和重新确定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使脱贫攻坚更加具有指向性。同时，各省共确定14.8万个重点贫困村，使贫困人口覆盖率达到80%。这些重大战略规划和相关配套政策根据脱贫攻坚在各个时期的突出问题提出，是一个逐步深化和细化的历史过程，对缓解中国的贫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加以强调，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释了脱贫攻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

①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②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

③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

④ 《全国已有78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农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

⑤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1994年4月15日），《江西政报》1994年第11期。

念。2015年6月，他又进一步强调扶贫工作要做到“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①同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了新的部署。2018年6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更加有效开展，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措施、加强统筹协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②精准扶贫的提出，是脱贫攻坚历史演进的必然要求，成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人民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由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近。

从脱贫攻坚的历史来看，由初期的区（片）到县，逐步推进到村，再全面推进到贫困家庭和贫困个体，扶贫地区日益聚焦，对象日益精准。事实证明，中国选择的渐进式的脱贫攻坚道路完全符合国情，成就巨大。

（三）建立健全脱贫攻坚的科学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制度建设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的全过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总结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时，提出的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③。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史，可以说是制度形成、发展和规范的历史，脱贫攻坚工作也是如此。摆脱贫困、民生富裕，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中国梦”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夺取全国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实现这个“中国梦”才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由此不断开拓制度建设的可能和制度推进的空间。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坚持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将脱贫攻坚作为

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战略性任务进行部署，分阶段、有计划地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专项扶贫行动，针对特定人群组织实施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安排保障脱贫攻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集中力量提高扶贫政策和各项保障措施贯彻落实的效率，推动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取得一系列卓越成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展脱贫攻坚的历史不是一个单维度的演进过程，“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一系列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深刻展示了各项制度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作用，是一个制度体系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④，从政策、资源、人力、项目、质量、动力、保障等多个方面不断创新，制定并实施因地制宜、各有特色的扶贫制度，形成定点扶贫、产业扶贫、驻村帮扶、行业扶贫、易地扶贫、金融扶贫、社会帮扶、建档立卡、东西协作等脱贫攻坚的范式。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制度又得到了有效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创新，顶层设计更为系统化、科学化、精准化。正是依托于这些制度实践和方式探索，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并加快完善，确保了脱贫攻坚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二、中国脱贫攻坚多元路径的深刻内涵

中国脱贫攻坚的持续深入推进，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越来越多元，有赖于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的逐步系统化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创新发展，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 ① 《习近平在部分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人民日报》2015年6月20日。
- ② 转引自《让全体中国人民迈入全面小康》，《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7日。
-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5页。

(一) 脱贫攻坚路径选择,源自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与时俱进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贫困的发生原因和类型也各不相同。有因基本生存条件未能满足而产生的饥饿贫困,有因物资匮乏引致的收入贫困,也有区域、流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总体性的产业不平衡。在社会广泛进步后,脱贫攻坚又包含教育、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内核。这些内核,有的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即期式的脱贫攻坚目标;有的出现在同一历史阶段的局部区域,导致脱贫攻坚总体上的非均衡性;有的则需要前瞻眼光。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脱贫攻坚都比较简单化,集中在单向性的“送粮、送衣、送救济”的物资帮扶馈赠方式上。这种方式将人民吃饭放在首要位置,缓解城市与农村整体极端贫困的现实困境,是符合当时经济不发达条件下脱贫攻坚诉求的。改革开放后,脱贫攻坚的路径向多渠道综合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正式启动。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资力度;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和医疗救助制度,投入大量救助资金来保障农村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职业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科技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为贫困治理的一部分而不断得到改善。这都改变了以单一经济指标为目标的治理方式,由物质帮扶向志智双扶转变,同贫困人群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脱贫攻坚的路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益发向教育、卫生、就业、健康等领域创造性地共生并进,由此产生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文化扶贫等,呈现出复杂丰富的面貌。如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工具的使用,近年来成为新的扶贫基建领域。生态扶贫、绿色脱贫也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绿色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贫困地区的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相结合,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等生态扶贫方式创新,以绿色发展取得显著减贫成效。近年来,随着基本公共卫生与人民健康观念普及,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不断深入,贫困人口健康领域短板突出、贫困地区灾害救助体系尚未完善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健康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的新内容,包括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以“厕所革命”“垃圾革命”为抓手实现农村人居环境友好,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疾病,不断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切实防止贫困地区及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重要讲话中强调:“要聚焦攻克脱贫攻坚战最后堡垒,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①其后,又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公共服务短板。这说明健康扶贫成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二) 扶贫格局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极强的责任感把消除贫困作为重大任务,集中力量解决温饱问题,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的扶贫效果。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治理的执行层面上,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成立国务院扶贫办公室,贫困省、区、县逐级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实行责任、任务、资金和权力“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和各级政府扶贫工作首长负责制,由政府统揽使用贫困治理专项工具,统一组织安排脱贫攻坚,包含公共设施建设、发展义务教育、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等。开发式扶贫成为主流后,对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脱贫攻坚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市场动力,供给效率低下。这使得政府逐步认识到要实现脱贫攻坚的普惠化和精准化,仅仅依靠政府一方自上而下的努力是不够的,“全能政府”思想和计划体制遗留的影响必须消除。另一方面,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各不相同,市场经济面对贫困治理固有的“失灵”不可避免,甚至由于扶贫公共产品的属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人民日报》2020年2月4日。

性较强而具有放大效应。脱贫攻坚的政府行为与市场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导致“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的普遍性问题。各级政府部门、以企业为微观主体的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难以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和谐互动。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第三方平台的强大合力，构建脱贫攻坚的系统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大扶贫格局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直接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大扶贫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后的又一重大的理论创新。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脱贫攻坚，各方参与是合力。必须坚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①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构建大扶贫格局，从政策到实践都得到了很好落实。2016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规划》明确指出，农林产业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科技扶贫是产业发展脱贫的重要内容，同时提出农林种养产业扶贫工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程、贫困地区培训工程、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乡村旅游产品建设工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升工程、森林旅游扶贫工程、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宣传工程、光伏扶贫工程、水库移民脱贫工程、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等“十三五”期间重点实施的产业扶贫工程。产业扶贫中，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之一，在因地制宜、推动贫困地区主导产业获得内生发展可持续动力方面表现良好。政府积极扶持支柱产业、龙头企业，贫困户以入股、务工等方式融入产业开发，分享产业发展红利等，已成为脱贫攻坚的常态。通过开发集体资源、开发物业租赁、发展消费扶贫等方式，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集体财产保值增值。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机制的构建也在探索中。公共服务的本质特征在于公益性，强调服务性，中国资源有限，地域分布不均匀，层次较多，这决定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立足国情，实现有效供给主体的多样性。公共服务的主体是地方各级政府公共部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参与正在规范。社会扶贫潜力充分释放，从多个维度将有限的资源用对、用好，避免影响脱贫攻坚成效。实践证明，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由政府保障权威性和有效性，引导并鼓励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格局，符合国情、政情，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 注重树立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自身发力的意识，厚植脱贫攻坚“人”的全面发展基础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要想真正摆脱贫困，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自身的全面发展，“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②。只有通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掌握生产技能，提升劳动者智力和素质水平，才能具备消除贫困的能力，才能保障脱贫后不再陷入贫困。中国在脱贫攻坚的路径上，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人是生产力第一要素，让人民真正摆脱贫穷，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在缓解贫困人口的生活之需外，有意识地采取必要措施使每个人都能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得到初级医疗救助。1952年11月，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推行速成识字法，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扫盲运动。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文盲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在农民中推选出一些优秀人才去进行一定的医学培养，学成后回来为村民服务，成为半医半农的卫生员。这是一支专门为农民解决基本医疗问题而成立的队伍。

① 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2日），《当代党员》2020年第9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改革开放以来，贫困现象除了收入贫困外，逐渐表现出其他多维性特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显著改善了收入贫困局面，在脱贫攻坚的路径选择上更为注重兼顾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两个层面，开发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相统筹，即为贫困人口提供物质、技术、人才等客观物质条件和工具后，逐步向“人”本身的素质提高和战胜贫困的奋斗愿望信心转变，在扶贫救助中注重提升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帮助他们掌握谋生的手段技能。采取的主要路径为：扫除文盲工作走向经常化、制度化；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破除贫困地区一些干部群众“等靠要”的深层意识；提高帮扶责任人“授之以渔”的本领，提升人力资本。1993年12月，中国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将文化、教育、科学普及等与满足贫困人口求知、求富、求乐的要求和发展农村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后，脱贫攻坚跨越到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的新阶段，突出开发式、内源式扶贫，更加注重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真正有效脱贫。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和内生动力的讲话，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核心要点是人的精神的提振、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再发挥和乡村资源的再配置。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要求切实坚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将脱贫攻坚和转变作风、锻炼队伍相结合。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规定所提出的要求，与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机会平等的增长”、“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正相耦合。在“精准扶贫”的治理框架下，特别是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后，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所包含的人文关怀内容逐步丰富，健康文明的日常生活方式得到大力倡导。

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和贫困主体自我发展意愿，对贫困治理路径的进一步多元化提出了要求。权利贫困、能力贫困以及生态贫困等维度的贫困得到足够的重视，片面强调收入提高即可解决贫困的传统观念得以改变。在倡导机会公平、共享增

长成果的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下，提升反贫困路径的包容性和多维度综合发展，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健康、教育、生活环境等共同发展，从而全面缓解农村贫困程度，成为共识。如利用一免一补、特困助学、雨露计划等进行教育扶贫，助力贫困户参与职业教育学习一技傍身。在解决了最基础的贫困问题后，对有能力、有志气的贫困户，各地政府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创业贴息政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发生的返贫现象；企业帮助当地培养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努力打造有当地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主导脱贫产业；健康扶贫政策无论是在贫困地区疾病预防、妇幼保健方面，还是在贫困人群健康管理和贫困地区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都已取得卓越成就，并将继续取得贫困人口收入的进一步增长、较长的预期寿命和较好的教育。向贫困地区村党组织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织举措。到2020年3月，全国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①，实现所有贫困村驻村工作全覆盖。这支队伍注重贫困群众的情感心理和精神信仰建设，引导他们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激发他们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整体提高贫困村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脱贫攻坚的路径选择和重要内涵，蕴含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党治国理政理念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的全面彰显，成功地推动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也为后脱贫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积蓄了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9）

^①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3月6日），《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